

## 边界生存: 当代巴勒斯坦文学的流散主题

余玉萍

**内容提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巴勒斯坦文学体现了鲜明的流散特征, 作家和诗人们以其浓重的 - + 笔调, 真切地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的艰辛与痛楚, 再现了流散族群于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的边界生存状态; 同时, 流散经验也赋予一些文学家独特的创作视角和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其“边界写作”为世界了解巴勒斯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关键词:** 边界生存 流散 巴勒斯坦文学

**作者简介:** 余玉萍, 文学博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

**Title** Boundary Living The Diaspora Theme in Contemporary Palestinian Literature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the diaspora has been characteristic of Palestinian literature. In their dense style, Writers and poets express in depth the hardness and pain whic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have suffered, and manifest the diaspora situation which the related groups live on the geographical borders as well as the imagined borders; meanwhile the diaspora experience has given a specific point of view and the ability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relative writers, who provid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boundary writing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of understanding Palestine and its people.

**Key words** boundary living diaspora Palestinian Literature

**Author:** Yu Yup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nd a Ph. D. of literature. Her main research field is Arabic literature. Email: sophieyu2003@sina.com

巴勒斯坦是现代世界上一块浸润了忧伤与不幸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多次被逐出家园, 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流散”悲剧。“流散”(diaspora), 也译作“离散”、“散居”, “流离”、“漂泊性”。这一出自《圣经·旧约》的词语, 原与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历史紧密相连, 60年代以后开始作为普通名词, 可用来指“有共同民族来源或共同信仰的人群”的一种流亡和分散。近二十年来, 随着后殖民批评的兴起, “流散”一词被赋予了更广阔的语境, 频频出现于与“文化属性”、“族裔”、“身份认同”等概念相关的研究中(王晓路等 307- 314)。

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 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流散的境遇下创作的小说与诗歌文本。他们的生活区域可能各异, 如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或以色列境内, 或其他阿拉伯国

家和世界各地<sup>1</sup>; 他们的创作语言也并不统一, 有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英语、法语等语种; 但是, 他们的写作因为拥有共同的身份意识而具备了共同的巴勒斯坦文化属性。虽然巴勒斯坦至今仍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实体, 但巴勒斯坦文学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 也正是由于国家实体的缺乏, 巴勒斯坦文学的流散特征又是十分彻底的, 显而易见的。

### 一、“边界生存”之物理空间

自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起, 巴勒斯坦难民揭开了流散的序幕, 其中有被以色列当局逐出家园者, 也有因生活所迫主动逃离者。逃亡路上的艰辛、恐惧与不归的命运, 被真实地记录在巴勒斯坦现代杰出的文学家格桑·卡纳法尼(1936- 1972年)的笔下。卡纳法尼出身于加沙中产阶级

家庭，年少时即和家人一起被迫流亡，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科威特等周边阿拉伯国家辗转迁徙。他积极参与民族解放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的官方发言人及其机关刊物的主编，最终在一场据说是摩萨德所设下的汽车爆炸案中被害。

1963年，格桑·卡纳法尼在贝鲁特完成了代表作《太阳下的人们》。该中篇小说讲述了三位企图越境偷渡到科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悲惨命运。年纪最大的偷渡者艾布·盖斯梦想着到科威特打工挣钱，养活食不裹腹的家人。第二位偷渡者阿萨德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被迫逃亡，同时也为了逃脱他叔叔给他安排的与堂妹结婚的命运。第三位偷渡者麦尔旺年仅16岁，因为哥哥数年前成功地偷渡到科威特，却没有履行给家人寄钱的承诺，因此赡养妈妈和全家人的责任落到了年少的麦尔旺身上，他决心到科威特寻求新生活，将挣到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负责运载偷渡客的水罐车司机艾布·赫祖朗曾是一名士兵，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服役于英国军队，而后参加了阿以战争，却在一次战役中因伤失去了性功能。万念俱灰的他遂将不择手段地挣钱作为最高目标，以填补生命的空虚。小说对偷渡的旅程展开了详尽描述，从最初司机与偷渡客的讨价还价开始，到各怀心事、忐忑不安地上路，在炎炎烈日的烘烤之下，终于到达了边境检查站。但是，由于边境检察官对司机调侃式的询问延误了时间，水罐车厢内温度骤高，三名偷渡客被活活闷死。在小说结尾，艾布·赫祖朗清理了偷渡者的尸体和遗物，他爬进车厢，悲伤地呼喊：“你们为什么不敲打水罐壁？为什么不喊？为什么？”“突然，整个沙漠开始回应着他的呼喊：“你们为什么不敲打水罐壁？为什么？”（卡纳法尼 11）

《太阳下的人们》反映了巴勒斯坦难民为生活所迫而进行的铤而走险的选择，在艰险难捱的旅程中，道路是颠簸不平的，思绪是起伏不定的，而卡纳法尼的句子很好地“表现了这种不稳定和波动起伏——现在时态服从于过去的回声，视觉动词让步于听觉或嗅觉的动词，一种感觉与另一种互相交织——努力抵抗着严酷的现实，保卫那些尤其珍贵的过去的片断。这样，太阳里的男人的不稳定现状再现了作者自身不稳定的状态，两者彼此共鸣”（萨义德 29）。主人公主动选择与家人分离，是为了奋斗之后的再团聚，然而，他们

的旅程却以死亡和永恒的分离告终，他们的梦想永远停留在国界线上。小说结尾水罐车司机的呐喊道出了作者的心声，因为流离失所的族群，倘若再不呐喊，倘若连话语的权利都不去争取，最终只会消亡在边界线和整个世界的关注之外。

## 二、“边界生存”之思想空间

巴勒斯坦人流落到周边阿拉伯国家和欧美等地，找到一处可供安身立命的场所后开始了新生活；但是，尽管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行为游移可能告一段落，精神和思想深处的漂泊却无法休止。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可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为人们所公认的成就，却无法真正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恰如大家所熟知的爱德华·萨义德，自小从巴勒斯坦迁徙到埃及，最终在美国成就了学业和事业，成为受人尊敬的知名学者，却总以“流亡者”、“边缘人”的身份自居，一生为巴勒斯坦民族权益著书立说，奔走呼号。他说：“我们最真实的现况就体现在我们从一个地方穿越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成为不断迁徙的任何地方的移民，或者混血，但却从不属于这些地方。作为一个离散和始终在迁徙的民族，这正是我们生活最深处的连续性”（萨义德 154）。

在巴勒斯坦当代著名作家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1920—1994年）的小说《寻找瓦立德·马斯欧德》（1978年）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巴勒斯坦流亡者形象。主人公瓦立德·马斯欧德在侨居地伊拉克创下一片天地，在流亡同胞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饱受着丧失国土和家园的痛楚，及未与穷苦乡亲共患难的歉疚，心灵无处归属。这种情绪促使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伊拉克的舒适生活，与亲朋好友不辞而别，只身前往黎巴嫩，投身到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洪流中。

难以消解的故国情结，这似乎是流亡者们所共有的情感。这样的情结，清晰地体现在当代巴勒斯坦最杰出的诗人、也是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一位诗人——马哈穆德·达尔维什（1942—）的诗篇中。他出生于巴勒斯坦上伽利利的一个小村庄，因反对以色列当局，曾多次被捕入狱，或遭软禁。他曾先后辗转莫斯科、开罗，后定居黎巴嫩，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执行委员会。1982年后随巴解力量一起迁至突尼斯，又因与巴解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独自前往巴黎。达尔维

什迄今共发表了近 30 部诗集和散文集,作品被译成 20 多种语言。他的诗歌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达尔维什的早期创作,多为言辞铿锵、斗志激昂的诗篇,如脍炙人口的《身份证》(1964年)。在此后的诗篇中,随着创作艺术的日臻成熟,也随着流亡生涯的逐渐展开,诗人放弃了直接的表达方式,在《巴勒斯坦的恋人》(1966年)、《我的恋人从睡梦中醒来》(1970年)、《我爱你或不爱你》(1972年)等诗集中,将巴勒斯坦比作自己深爱的女性,而故乡的土壤、茉莉花、鸟儿、橄榄和棕榈树等一切景物都成为“爱”的意象,传递着诗人对故土的深情厚意:“在太阳的血里 / 我见到你,在孤苦伶仃、苦难重重的歌里 / 我见到你,渗透了大海和沙滩的盐粒 / 你美得宛若大地……儿童 / 和茉莉……”(《阿拉伯现代诗选》341)

在长年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涯中,诗人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期待,他将自身与故土紧密相连,强调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与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不能分离的,如他在诗中所言:我的偶像啊,你的双眸 / 是我梦想的放逐地 / 我俩在那里相遇 / ……(达尔维什 583)

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也开始感到些许的失望。80年代以来,诗人在呼吁坚持斗争的同时,流露出早期作品中所没有的婉约和惆怅。在 1984年,他写下了著名的诗句:

在最后的前线之后,我们将去往何方? /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将飞向何处?<sup>④</sup> / 在最后的空气之后,植物将在何处安睡? / 我们将在深红色的水汽中写下我们的姓名 / 我们将剪断歌声,用我们的血肉来完成 / 在这最后的通道,我们将死去 / 这里,我们的鲜血将橄榄树栽培……<sup>(四)</sup>

与此同时,长期的流亡生活,造就了一颗习惯漂泊的心。在诗集《陌生人的床》(1999年)中,诗人发出这样的感叹:离开了流亡,我是谁?奥斯陆协议签署后,达尔维什几经申请,得以对阔别 30 年的巴勒斯坦进行短暂重访,此时,他对记者坦言:“我无法对流亡表示任何怨言。流亡是非常慷慨的,富有教育的,供给我以文化,扩展了我的人文知识和语言知识范围,使我的诗歌表达包含了人类之间和文化之间的对话。我无法放弃这

种流亡,因为它是我生命的基本要素。”<sup>⑤</sup>流亡,最初是源自生命的一种无奈选择,它在使心灵变得无可归依的同时,亦使得思想遨游于“边界地带”,从而带来了超越“中心”(民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自由。在这一点上,达尔维什与其挚友爱德华·萨义德形成了共识。

在大批巴勒斯坦人流散世界各地的同时,那些固守家园的人们又如何呢?出生于海法的作家伊米勒·哈比比(1921-1996年)在自己的代表作《乐天的悲观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1974年)中给予了经典的诠释。伊米勒·哈比比被认为是以色列境内最著名的阿拉伯作家之一;此外,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曾参与创建以色列共产党,还曾担任以色列议员的职务。

《乐天的悲观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是一部卡夫卡式的作品,以荒诞的手法描述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在成为以色列公民后的奇异生活,被评论家称为“阿拉伯现代文学中最杰出的讽刺小说”(薛庆国 151)。故事起始于 1948 年战争结束后不久,赛义德离开在黎巴嫩的妈妈和妹妹,偷偷返回自己的出生地海法,要求政治避难并表示合作,却遭到以色列当局的怀疑,被投进监狱。此后,他遇到种种怪事,误解丛生,他发现自己似乎生活在真实和虚幻的两重世界之间,被两种相反的作用力所牵引,在忠诚于巴勒斯坦乡亲还是忠诚于犹太国家之间徘徊。小说以赛义德写给故事叙述者的信件构成,并在结尾处指出这些信件都只是一些“狂人呓语”。然而,赛义德真的疯了吗?小说的标题体现了作者的用意:“赛义德”在阿语中意为“幸福者”,“奈哈斯”则为“不幸者”之意,“乐天的悲观者”是作者将阿语“乐观者”和“悲观者”二词结合所得,旨在说明赛义德是个身处两个相反的世界,却不属于任何一方的矛盾性人物: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疏离了亲人;作为一个非犹太人,他又是以色列的“他者”,因而集合了喜剧与悲剧、荒谬与现实于一身。读者不禁要问:“哈比比小说中的人物是纯粹的虚构还是在用他那极度的幻想接近现实?他是一个凭空创造出来的人物,还是还原了我们生活的真实本质?”(萨义德 18)

与其笔下的主人公截然不同的,哈比比本人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都受到了欢迎,晚年他曾获得巴解组织颁发的耶路撒冷文化勋章,后又获得以色列文学大奖,这项大奖,代表了以色列文

学界对一个阿拉伯裔作家的最权威公认。在他的成就面前,出生于伊拉克的以色列作家萨米·米歇尔不禁感叹道:“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到在我们中间存在着一种阿拉伯文化;并且,它已经生长出一个崭新的、茂盛的文学生。”<sup>16</sup>

### 三、“边界生存”之跨文化空间

巴勒斯坦作家对于创作语言的选择与他们所处的地域密切相关。那些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或流散至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作家基本上坚持用阿拉伯语进行创作,也有双语创作者,如前文提到的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

英语创作者则分散于世界各流散地,尤以生长于北美当地的年轻作家为主;此外,使用法语和德语创作者亦不乏其人。巴勒斯坦文学家用欧洲语言创作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巴勒斯坦文学的跨文化发展倾向,是第三世界文人在西方语境下重建东方空间的一种突出尝试。较新的佳作,如美国巴勒斯坦裔女作家莱依拉·哈拉比的处女作《西约旦》(2003年)。该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多声部叙事方式,叙述了一个巴勒斯坦家族中来自不同家庭的四位姐妹的成长经历,直接反映了当代阿拉伯人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在主人公哈拉及其继母的身上,体现了当代阿拉伯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一面,与西方的传统看法形成反差。小说发表后,获得美国笔会特为少数民族所设立的文学奖项(Pen/Beyond Margins Award)。

至于那些居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作家,多数人仍使用阿语写作,少数人兼用阿语和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写作又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以色列建国始至60年代。此阶段,阿以冲突由风声渐起而逐步趋向白热化,仅有少数阿拉伯人出于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考虑,顶着被阿拉伯世界视为“叛徒”的压力,选用希伯来语写作,作家阿塔拉·曼苏尔(1934-)被视为他们的先锋。在用阿拉伯语写成的首部小说遭到抨击后,他改用希伯来语创作了一部以批判以色列基布兹模式为主题的小说——《在新光下》(1966年)。这部最早由阿拉伯裔作家撰写的希伯来语小说,在出版后意外地得到了以色列国内读者的好评。

第二阶段始自60年代末。随着以色列国力的强盛,也随着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日渐本地化,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巴勒斯坦作家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不少刚刚走上创作道路的年轻人。其间,阿以

之间虽历经几次战争,但中东和平进程毕竟开始启动,以色列与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和好的意识;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阿拉伯裔的政治作用开始有所发挥。阿拉伯裔作家精通希伯来语,对犹太人的现实了如指掌,他们不仅自己创作小说,也从事双语翻译工作,成为沟通两种社会和两种文化的媒介。安通·沙马斯(1950-)类似自传体的希伯来语小说《阿拉伯式图饰》(1986年)在这方面反响最大。

《阿拉伯式图饰》由两个部分组成:“故事”和“讲述者”。“故事”叙述19世纪初沙马斯的阿拉伯基督徒家庭从叙利亚移民至巴勒斯坦,定居于伽利利附近一个小村庄的传奇经历。在安通·沙马斯笔下,故乡是个充满了欢乐与悲伤、热情与迷信的美丽田园。作者围绕“我曾经是谁”的问题,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回忆在尤素福叔叔身边听故事的场景,直至犹太军队对家乡的占领。“讲述者”则围绕“我现在是谁”的问题,叙述作者本人从美国爱荷华州和巴黎游学归来,作为二等公民生活在以色列统治之下的感受。小说《阿拉伯式图饰》出版后,引来了各方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美国,1988年《纽约时报》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在以色列,它一直是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界所热评的对象,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更有评论认为“沙马斯对希伯来文学的贡献,可媲美于二十世纪印度、波兰、西印度群岛、或俄国出生的英语作家对英语文学所作的贡献,也可以媲美于北非和中非、埃及、安的列斯群岛、黎巴嫩、比利时、或罗马尼亚的法语作家对法语文学的贡献”<sup>17</sup>。

阿拉伯评论界亦例外地对待安通·沙马斯。虽然《阿拉伯式图饰》始终未被译成阿语,阿拉伯评论界还是通过其他语言的译本阅读了该书,对作者在总体构思、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匠心独运,及其一些现代写作技巧表示赞许,但对其选择希伯来语写作则多持批判态度,因为“语言是民族身份构成的根基”。而安通·沙马斯本人对此的回应亦十分坦然,他说:“假如我用阿拉伯语写作,我的叔伯、姑姑和姨妈们会说些什么?我是把希伯来语当成了伪装的面面……”因为:“你不能你所爱的人明白的语言来描绘他们;否则,你便无法自由地撰写。”<sup>18</sup>的确,对于沙马斯而言,用希伯来语写作赋予了他独特的跨文化空间,使之能够更客观、更从容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包

括其弊端所在,同时也使得本民族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感受更好地为他者所了解。

在“边界写作”(boundary writing)和“跨文化写作”(transcultural writing)作为一种后现代话语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的当代文坛,以安通·沙马斯为代表的以色列阿拉伯裔作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无论于以色列,还是阿拉伯文学界,他们的文化身份归属依然是一个疑问,但他们的双重文化背景和创作实践,无疑为两个仍在冲突中的民族构建了相互对话的中间地带。

在现当代阿拉伯文学史上,巴勒斯坦文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同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对于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sup>(1)</sup>半个多世纪以来,流散的巴勒斯坦人始终在为收复权利、回归家园进行着不懈的集体斗争,在维持和支撑巴勒斯坦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文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它记载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和牺牲、勇敢与抗争,为民族文化身份的延续提供了可靠的记忆之源。

#### 注解【Notes】

<sup>1</sup> 几乎每次中东战争都引发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如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后,75万巴勒斯坦人被逐出家园,其中三分之二来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其余者流散到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仅有15万巴勒斯坦人留在以色列境内。难民的归属成为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中的一个焦点和核心问题。

<sup>(4)</sup> 爱德华·W·萨义德的纪实作品《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即取名于这句诗。

<sup>(四)</sup> Mahmoud Darwish "The Earth Is Closing on Us", trans Abdullah alUdharj *Victims of a Map* (London: alSaqi Books 1984), <http://www.mehbooba.co.uk/poem sandpor>

ety/index.php? action = article& cat \_ id = 003002003002002& id= 514

<sup>1/2</sup> NouriA FJarrah Mahmoud Darwish "Home is more lovely than the way home", <http://www.aljadid.com/interviews/0319aljarrah.html>

<sup>1/4</sup> Rachel Felkay Brenner "Israeli Arab Fiction and Its Recep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6 No 1, Autumn 1999.

<sup>3/4</sup> Kamal AbdelM alek and David C. Jacobson,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Identitie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149.

(1) 在阿拉伯作家协会评选的20世纪最佳阿拉伯中篇小说(105部)中,巴勒斯坦的作品占7部,其中包括本文所涉及的3部小说,即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的《寻找瓦立德·马斯欧德》(列第2位)、格桑·卡纳法尼的《太阳下的人们》(列第5位)、伊米勒·哈比比的《乐天的悲观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列第6位)。参阅仲跻昆:《阿拉伯现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387。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爱德华·W·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金玥珏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阿拉伯现代诗选》,郭黎译。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

格桑·卡纳法尼:《太阳下的人们》(阿文版)。黎巴嫩: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63年。

马哈穆德·达尔维什:《马哈穆德·达尔维什诗集》(阿文版)。黎巴嫩:贝鲁特回归出版社,1971年。

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薛庆国:《阿拉伯文学大花园》。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陈富瑞